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促织经

外十三种

「宋」贾似道等著

廖莲婷整理校点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促织经

外十三种

〔宋〕贾似道等著

廖莲婷 整理校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促织经：外十三种/(宋)贾似道等著；廖莲婷整理校点.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2

(宋元谱录丛编/顾宏义主编)

ISBN 978-7-5458-1411-8

I. ①促… II. ①贾… ②廖… III. ①蟋蟀—基本知识
IV. ①Q96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2005 号

责任编辑 顾 佳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促织经(外十三种)
[宋]贾似道 等著
廖莲婷 整理校点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8,000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411-8/Q·2
定 价 26.00 元

总序

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①《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著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玑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至唐代

^① 朱积孝：《谱录述略》，载《图书馆》1995年第6期。

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① 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

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等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道《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密切

^①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茶经》，中华书局影印本。

相关。

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绾《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著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

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中游重

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影响后世颇大。

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編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曰：“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唧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碗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

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著述的一个特色。

随着谱录著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

宋代以前，谱录文献被附入别类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将《竹谱》、《钱图》等归入“史部·谱系”类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将《钱谱》、《相鹤经》、《鹰经》、《相马经》、《相贝经》等归入“子部·农家”类。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无专类可归，如北宋《崇文总目》将《竹谱》、《笋谱》、《茶谱》、《花木录》、《钱谱》等归入“子部·小说”类，《相鹤经》、《鹰经》等归入“子部·艺术”类；而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录收入“食货”类，其“食货”类下分六小类，其中《钱谱》、《鼎录》、《刀剑录》、《锦谱》等归于“货宝”小类，《墨谱》、《砚录》、《文房四谱》与《香谱》等归于“器用”小类，《相鹤经》、《相马经》、《鹰经》、《禽经》等归于“豢养”小类，《竹谱》、《笋谱》、《荔枝谱》、《花谱》、《木谱》等归于“种艺”小类，而《茶谱》、《酒录》等则分别归于“茶”、“酒”两小类。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尤袤有鉴于此，遂在其所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子部”之下专门设立了用来收录上述相关书籍的“谱录类”。

对于尤袤在四部分类中设置“谱录类”的原因，清代馆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未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鸢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

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所以在其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沿用《遂初堂书目》“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①但因属初创，故而《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所收录的尚还混录有《侍儿小名录》、《警年录》之类当归入“传记类”的书籍，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则专门收载记物之谱录，并据图书的内容，还于其下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与“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小类。由此，谱录当以记物为主的定义方才正式定型。

因岁月久远，宋元时期的卷帙繁盛的谱录著述多有佚失，其具体数量今日已难以考述。今日可考录的宋元谱录，大致在120种上下，其中宋代谱录约100种。这流传于世的百余种宋元谱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其书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元李衍《竹谱》等。二是其书通过《说郛》等丛书摘要载录才得以传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谱》、田锡《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从一书中抄录一篇别出而为单行本者，如宋初陶穀《清异录》本属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笔记著作，其中“茗荈门”被后人抄出单独成书，题名《荈茗录》，成为一本屡为后世引用的茶书。南宋著名文学家范成大撰有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序》。

《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诸篇，被后人分别抄出单行题《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费著的《笺纸谱》、《器物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等，也本为其所著的方志《成都志》中诸篇，但为时人所珍视，而抄录别行者。对此，本丛编皆视为单独著述，分别编录于各类之中。

从现存的宋元谱录情况看，其著者遍及社会各层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贵为天子者（宋徽宗《大观茶论》），有官拜宰执大臣的（如苏易简、丁谓、欧阳修、周必大、贾似道等），有著名文人、书画家（如宋苏轼、米芾、洪迈、范成大、陆游，元倪瓒、杨维桢等），有隐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侣（如释仲仁、僧赞宁等），另外有署名别号的，如题名审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图赞》、渔阳公撰《渔阳石谱》、鹿亭翁撰《兰易》等，或是因为此类谱录乃属“小道”，为免世人“玩物丧志”之讥而不愿题真实姓名者。但也有个别谱录的著者姓名原本失传不详，今所题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书籍时所添加，其真伪于今日已不易探究，故本丛编一仍其旧。

本丛编所收录宋元诸谱录，大体先据其内容归入其类，同类者大体依据著者生卒年月为序编列（生卒年不详者，即以其主要活动年月为据编排）。每种谱录正文前，皆简述其撰者生平、谱录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内容、传世版本等情况；其篇末，

酌收有关序跋、题记等，以助于阅读。

本丛编所收录诸谱录，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种，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显舛误、脱漏、衍文者，则以圆括号“（ ）”标示其为误字、衍文，而以方括号“[]”标示其为正字、补字，但不另出校勘记。

又本丛编在编纂中，参考了不少前贤时哲的研究或校点整理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示指出，故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顾宏义

乙未五月于海上梦湖书屋

前言

唐中叶以后，汉唐文化的雄浑气象不复现，雅文化层面走向精致内敛，俗文化开始热闹繁华。到了宋代，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市场商品流通频繁，再加上统治者重文治，崇儒右文，文化发展达到了另一种极致。宋文化呈现出内省、精致的取向，并且市井文化也蓬勃发展。如果说汉唐文化是一种粗放、外倾、色调浓烈的开放型文化，表现的是一种外向、粗犷、瑰丽、豪华的特色，那么宋代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向、色调淡雅的文化，表现出内敛、精细、雅致的特色。宋人的审美取向脱去繁丽丰腴，现出精美细腻，注重雕琢和品味，风雅赏玩成为时代风尚，文房四宝、花鸟禽鱼变成宋人的日常寄兴所在。及物而谱，日见而录，于是宋人撰写了大量的有关花鸟禽鱼的谱录书籍，书中的精细笔触，雅意闲情，正是宋人文化心理的外在表现。

博识多闻，是儒家强调的治学理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言之，历来为人所重视；作为经书之一的《尔雅》也有所体现，《尔雅》共十九篇，其中有关“鸟兽草木”的就有七篇，即有关动物的有《释鸟》、《释兽》、《释畜》、《释虫》、《释鱼》篇章，有关植物的有《释草》、《释木》篇章。这种“多识”的追求发展到宋代，就成了一种“尚博”的风气，以致宋人有一

物不识、一事不知为耻者。随着“鸟兽草木之多识”的日益增长，经济的发展繁荣，士人阶层的崇尚，以及印刷业造纸业的发达、市场的繁荣，宋代出现了大量的草木、鸟兽、虫鱼谱录，如《蟹谱》、《蟹略》、《促织经》、《橘录》、《菌谱》等。这些书籍到了后世仍然受到重视，《四库全书》在著录历代书籍时，在子部下设“谱录类”及其系属之门“草木鸟兽虫鱼之属”，收录有大量的宋代谱录。可知“鸟兽草木”之书，虽庞杂而细碎，然而从不被世人所偏废。

宋人深知“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在于多识，“鸟兽草木之学”在宋人眼中是实学。郑樵认为“逐鹿”需“知有山”，“求鱼”要“知有水”，因而谱录虫鱼鸟兽者“尤详其名”、“明其品汇”、“究其性情”等等，极见其“格物”之精神。宋人以“以备博物”为出发点撰写了大量的“草木鸟兽虫鱼”之谱，如范成大的《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有的谱录还发展成专门记载一区域的风物特产专书，要么志在推介家乡物产，如蔡襄的《荔枝谱》、陈仁玉的《菌谱》；要么志在记录宦途所见，如韩彦直의《橘录》。有的则是为了表忧民之志，治农之本，如曾安止的《禾谱》。有的撰以明其制物养生之道，以使食之利于人，如僧赞宁的《笋谱》。有的则是兴趣所在，间表其爱物之心，如贾似道的《促织经》，等等。而这些书的出现，不仅彰显了宋代文化的繁荣，还为世人保留了大量的科技文化资料，对现今的博物学、农学、生物科学、科技史学以及经济的发展仍有促进作用。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对宋代

的谱录文献尤其重视，他说“每当人们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关键所在”，还在植物学卷、农学卷、食品卷等论及多种“草木鸟兽虫鱼”谱录。并且，这些谱录很多都是我国甚至世界上的第一部物类专著，如韩彦直의《橘录》，李约瑟对之高度赞扬道，“直至1500年，即三个多世纪以后才出现了可以与韩彦直的著作相匹敌的著作”。此外，这些谱录还反映了当时交通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如蔡襄的《荔枝谱》，记载荔枝在宋代已“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漠、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

“尚雅”和“尚博”，为宋代文人阶层中的两大风气，士大夫阶层以追求高雅的情趣和广博的学识为荣，这就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雅好赏玩之风，品蟹赋诗，剥橘识味，赏花交友，观笋格物，斗虫寄兴，日益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并在他们手中发展得越来越精微雅致。这些因素共同成为谱录在宋代大量涌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缘。并且，“尚雅”使得宋人之谱录语言雅致，所述精细，曲尽风物之妙；“尚博”又使得宋人在撰述谱录时旁征博引，援据奥博，详尽趋全，广搜巨罗。因而，宋人之谱录，体例成熟，蔚为壮观。

食蟹是中国一种传统的美食文化，尤其在文人之中，品蟹是和饮酒、赏花、赋诗并称的美事。唐代诗人李白曾赞道，“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宋代经济发展繁荣，文人士大夫生活优越，形成尚雅赏玩之风，这种风

气在蟹文化上的体现之一就是志蟹专谱的出现。傅肱所写的《蟹谱》，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当时品蟹的文化现象。若干年以后，高似孙在《蟹谱》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前人资料，又编撰了《蟹略》。这两本书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两本关于螃蟹的专书，介绍了多种精美蟹馐以及与蟹相关的诗文。高似孙曾写过《誓蟹羹》一诗，“年年作誓蟹为羹，倦不支吾略放行”，充分展现了其爱蟹之心。书中还记载了许多珍奇蟹馐如“糖蟹”，糖蟹在唐代便已是地方贡品，到了宋代仍然备受欢迎，书中所引之黄庭坚诗句“海馐糖蟹肥，江醪白蚁醇”，正是宋人喜爱糖蟹之美的明证。宋人不仅讲究蟹的味道鲜美，还注意造型优美、诗文之美，这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留下了引人瞩目的一页。

秦、汉以来，人们对动植物的认识不断加深，到了宋代，著录和研究此类事物的专书盛极一时。宋时经济中心已在南方，农牧、园艺、医药的发展推动人们记录和研究具有经济价值的动植物。而且，宋代内外来往频繁，经济发展和生活的需要促使人们对边远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宋人由此兴起了对各地尤其边远地区的动植物研究热潮，涌现出许多记载地方异物的谱录，如范成大的《桂海兽志》、《桂海禽志》、《桂海虫鱼志》、《桂海果志》分别记载了广西、南海等地的珍禽异兽、珍奇果木等。其中《桂海禽志》记载了南方包括孔雀、鹦鹉、乌凤、山凤凰、水雀等十三种珍禽，其书前小序言“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问。又余以法禁采捕甚急，故不能多识。偶于人家见之，及有异闻者，录以备博物”，留下了许多珍禽资料。《桂海兽

志》，记载了南方包括象、蛮马、大理马、果下马、蛮犬、猿、乳羊、火狸、懒妇等十八种异兽，其中还言及广西人以异兽制药，如“山獭，出宜州溪洞，俗传为补助要药。洞人云，獭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兽悉避去。獭无偶，抱木而枯。洞獭尤贵重，云能解药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许，敷治立消。一枚直金一两，人或求买，但得杀死者，功力甚劣”。今宜州有山獭药酒，可见其由来已久。而《桂海虫鱼志》记载南人捕捉蚺蛇更是具有神秘色彩：“蚺蛇，大者如柱，长称之，其胆入药。南人腊其皮，刮去鳞，以鞣鼓。蛇常出逐鹿食，寨兵善捕之。数辈满头插花，趋赴蛇。蛇喜花，必驻视。渐近竞拊其首，大呼红娘子。蛇头益俯不动，壮士大刀断其首，众悉奔散，远伺之。有顷，蛇身觉，奋迅腾掷，旁小木尽拔，力竭乃毙。数十人舁之，一村饱其肉。”南方丛林繁茂，多珍禽异兽、名贵草木，南方之人生养于此，穿行于丛林草木之间，日与虾鱼虫兽为伍，形成一地特有风俗，与中原之风颇不相同，范成大所记反映出南方神秘瑰奇的文化色彩。另《桂海果志》记载有一种“人面子”果，“如大梅李，核如人面。两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蜜煎”，真可谓奇异非常；再如所记“波罗蜜”一果，热带以及亚热带地区才有之，范成大言其“大如冬瓜，外肤礧礧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极甘。子瓢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为古人认识南方水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宋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士大夫热衷于花草果木的记录，以夸耀家乡风土物产，并在市场上争奇。当时人即注意到

这种现象，如曾安止在《禾谱序》中言“近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尝集牡丹、荔枝与茶之品，为经及谱，以夸于市肆”。

荔枝盛产于巴蜀、闽粤、两广，汉初荔枝才开始流通到中原，由于交通的阻隔，北方人极难品尝到鲜荔枝，魏文帝把荔枝比作“西域蒲桃”，唐贵妃更有“一骑红尘妃子笑”之刺。而蔡襄为莆阳人，感叹荔枝由于“道里辽绝，曾不得班于卢橘、江橙之右，少发光采”，所以撰述《荔枝谱》以称扬家乡风物特产。《荔枝谱》记载三十二种优质荔枝品种，尤以陈紫为贵，以至于“富室大家，岁或不尝，虽别品千计，不为满意。陈氏欲采摘，必先闭户，隔墙入钱，度钱与之，得者自以为幸，不敢较其直之多少也”。

《菌谱》，陈仁玉撰，记载其家乡浙江仙居县特产之菌类品种十一种。书约成于淳祐五年，详尽介绍菌的生产、形状、色味、食法和医药价值。所记之合蕈、稠膏蕈、栗壳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黄蕈、紫蕈、四季蕈、鹅膏蕈等台州食用菌，南宋时已为人所重。

僧赞宁的《笋谱》，记载笋之品种九十八种，涉及许多鲜为人知的竹类，如可造大船的丑丘竹、沛竹，可为手杖的邛竹，可为斗的汉竹，可做布鞋的白竹，等等。所记还穿插一些生动的典故和有趣的传闻，读之使人深感竹笋文化的悠远。赞宁深谙笋的药理，对笋之烹调和食法诠释极为精细，如：“凡食笋之要，譬若治药，修炼得门则益人，反是则损。采笋之法，可避露，日出后，掘深土取之，半折取鞭根，旋得，投密竹器中，